

国家理性学说兴起于16世纪初,其真正兴盛之际大约是在16世纪80年代后,从这一时期开始一直到1651年,霍布斯《利维坦》出版的一段时间是国家理性学说支配欧洲政治思想的阶段。国家理性学说在欧洲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系统的现实主义政治分析方法、非道德的和中立化的政治策略建议模式,从而为现代政治及现代政治理论的转向奠定基础。

从历史角度来看,教皇迁居阿维尼翁之后的意大利的政治真空导致了一系列纯粹世俗性/暂存性的权力(temporal powers)。由于这种政治权力不具备传统的正当性,只是教权冲突的一次意外产物,因此意大利半岛上以小僭主为代表的统治者才会对国内外可能存在的权力威胁特别敏感,而是基于安全感的匮乏才促使他们不断地追逐世俗性的权力,由此诞生了现代政治史上第一批全权的、非道德的主权国家。

这类国家被布克哈特称为“作为工艺品”的文艺复兴国家,其特征在于国家行为在军事、政治和外交等诸方面的全面理性化。伴随着复式记账法和可交易的国家公债在这个时期的出现,使得国家行为为进一步理性化及可计算化成为可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国家理性学说才走上历史舞台。

## 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方法和国家学说

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是他思想的内核。维罗里曾经说:“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在学界还存在什么共识的话,那么,这个共识就只可能是,马基雅维利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理想家。”但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已经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现实主义和古代政治科学,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极端主义”(extremism)。马基雅维利重新发明了一种新的视角转化方式,即在常态现实与非常态现实之间的视角转换。这种非常态的视角在名义上是一种“现实主义”,实际上却是一种在现实中几乎无法抵达的“极端状态”。这种极端主义的实质是将传统中处于“例外状态”的“极端”视为某种意义上理论上的常态,传统中认为是例外的场景、状态和情况则转化为理论上固定的、稳定的甚至永久正常化关系。

另一方面,马基雅维利的国家学说对于现代国家理论的意义在于,他提供了一种“获取国家”(acquisitive state)的概念。对他而言,“不自由的国家”需要以“自由国家”作为工具,“自由国家”(如罗马)同样需要以“不自由的国家”(如罗慕路斯的君主专制)作为工具;“公益”需要以“私利”为工具,“私利”同样需要以“公益”为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中立性就以国家的工具性为形式出现了。而在进入现代抽象国家之前,工具性国家构成了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逻辑中介。

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方法和国家学说都对其后的国家理性学说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马基雅维利的真正魔力在于,他会让他的反对者变得和他相似。马基雅维利的反对者在反对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也几乎都提出了一种对“好的国家理性”的追求。他们或者主张,“好的国家理性伴随好的统治者出现,坏的国家理性则与坏的统治者共生”,但这等于循环定义;或者主张,好的国家理性出于公共利益,坏的国家理性出于统治者的个人私利,但由于整体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公共性本身缺乏规定,这样的区分也一定会陷入虚无。康帕内拉的政治思想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因此,可以说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反马基雅维利主义彼此密切相关,他们共同反映了通过马基雅维利主义这一中介介入历史生活的悲剧式二元性,亦即马基雅维利主义包含的那种难分难解、事关根本的结合——毒害力和治疗力的结合。后起的国家理性学说的另一种代表塔西陀主义也具有这样的特质。

## “红色塔西陀主义”和“黑色塔西陀主义”

16世纪80年代短短十年间,塔西陀开始在欧洲知识界风靡起来。自从帕斯夸尔的第一部关于塔西陀完整的政治评注出版以后的50年,塔西陀主义一直是整个欧洲知识界最为引人注目的一



利维坦

# 文艺复兴晚期的国家理性学说

■韩潮

马基雅维利的国家学说对于现代国家理论的意义在于,他提供了一种“获取国家”(acquisitive state)的概念。对他而言,“不自由的国家”需要以“自由国家”作为工具,“自由国家”(如罗马)同样需要以“不自由的国家”(如罗慕路斯的君主专制)作为工具;“公益”需要以“私利”为工具,“私利”同样需要以“公益”为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中立性就以国家的工具性为形式出现了。

个人物,他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其他塔西陀学派中人,可以说塔西陀主义几乎是建立在利普修斯的文献工作基础之上。利普修斯几乎以一人之力同时复兴了两个传统,一个是塔西陀主义的传统,一个则是以塞涅卡著作为代表的斯多亚主义的传统。在他那里,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第一次在新斯多亚主义的人性观念里找到了对应物。利普修斯的斯多亚主义著述中关于公民社会的起源论证以自我利益为基础,完全忽视表达了关于正义的讨论。他的新斯多亚主义真正暖昧的地方在于,自我利益和个体自律走向了同一条道路。利普修斯的新斯多亚主义政治所表达的是这样一幅政治图景:一方面,公民需要遵从于理性,统治者需要运用理性和政治美德去治理;另一方面,对统治者自身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让理性统治他自己。

除此之外,利普修斯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是他关于“混合审慎”的界定,他的“混合审慎”混合了正派(honesta)和利益(utilia)。由于利益话语的引入总归在道德上面临着指责,利普修斯采取的论证策略是,尽量缩小欺瞒或者狡黠在道德上的危

害程度,对其进行必要的分类,接纳一些、容忍一些、排斥一些。为此他区分了三种“狡黠”,接纳一些小的狡黠,容忍一些中等程度的狡黠,排斥一些极为恶劣的狡黠。由于利普修斯所试图接纳的“轻微的狡黠”实际上都带有一种道德上的防御性成分,他对此的界定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接近后来在格劳秀斯那里出现的“最低限度的道德”的某些因素。在他那里,我们几乎已经看到了“自我保存”观念的初次出场,它首先是作为“国家理性”的辩护性概念而出现的,其后会转化为后世自然权利学说的奠基性概念。

博卡罗是第一个使用“国家理性”作为书名的作者,他第一次让这个词出现在公共话语的目录内,他的《国家理性》一书是文艺复兴晚期最受欢迎的政治理论著作之一。博卡罗一方面承认存在着某种不同于一般理性的、作为统治技艺的国家理性,另一方面他让马基雅维利那里呈现的统治技艺更为中性化,防止这种统治技艺逾越正统道德的界限。而他的道德立场可以说是一种“内在实用主义”(intrinsic pragmatism),简单来说,博卡罗实际上主张,为了“显得虔诚”,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真正的虔诚”。这种内在实用主义的表述是一种典型的“利益话语”,对于虔诚的衡量是“有效”(efficacious),而不是合于神法或自然法的规范。

而博卡罗的国家话语和他的利益话语几乎是一致的。在他那里,“国家理性无非就是利益理性”。博卡罗将“国家”和“利益”放在同一个位置上,表明了“国家话语”和“利益话语”某种意义上

的合流,由此造成了国家理性的中立化倾向。博卡罗利益话语的继承者尼德汉姆发展出一种“利益不会说谎”的说法。在他那里,“利益不会说谎”意味着,如果你能够理解一个人的利益所在,那么你就可以明确地知道,他将怎样行事,因为你可以预见到利益将如何支配他,假设他足够明智并知晓自己真正关心的是是什么,那么他一定会按照利益给他规划的路线向前走。也就是说,伪装、狡黠乃至于谎言等伪善的面具可以为“利益话语”所看破。

利普修斯提出的“混合审慎”概念让“狡黠”进驻审慎话语内部,但审慎话语的问题恰恰在于,如果所有人(或者说所有的君主)都接受了这样的教诲,乃至于所有人都采取这样的策略,那么就是一种以狡黠应对狡黠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理性的受众群体或许就进入了这样一种博弈状态:所有人都蒙上了一副面具,所有人都看不清对方的真面目,所有人也都弄不清对方的真实意图。因此,“利益话语”实际上就构成了对传统国家理性学说中的“审慎话语”的一个颠覆。国家理性学说的内部矛盾也就在于此。

最后,我们进入了国家理性学说与现代自然法学说的交汇处——霍布斯的思想。霍布斯的思想与国家理性学说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纠缠,一方面霍布斯早期思想诞生于国家理性的文化世界,另一方面,当他开始自觉地对国家理性学说尤其是塔西陀主义感到不满并寻求修昔底德的帮助时,他就开始了与国家理性的告别。这同时也可以体现在他对审慎概念的批判之上,他开始将国家理性的核心概念“审慎”清除出他的体系,取而代之的是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知识。但是,霍布斯其实并没有完全摆脱掉国家理性学说的影响,他的第三自然法论述中牵涉到的“愚人”问题其实是国家理性学说的一个修辞性翻版,他对“愚人”的驳论很难说具有强烈的说服力。这恰恰是因为,霍布斯分享了

他所处时代里国家理性学说的一些基本前提,他和“愚人”的矛盾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理性两个传统分支——“利益话语”和“审慎话语”之间的矛盾。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以霍布斯代表的现代自然法理论是对国家理性学说的回应和重构。在国家理性学说中呈现为“寻找例外”的“审慎话语”,以及在国家理性学说中呈现为“中立化”的“利益话语”和“国家话语”,恰恰在霍布斯的思想矛盾里体现出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12CZ0052》研究成果,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科研评价要突出“唯原创性”标准

■刘立

2018年10月以来,国家开始大力破“四唯”“五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以及唯帽子)。新时代科研评价当立“唯原创性”为标准。

什么是“原创性”?如何评价“原创性”?英国针对大学的“卓越科研评价框架”关于科研成果原创性评价标准,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提出,原创性是科学的最高价值。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将原创性视为最高价值。他将原创性纳入科学的五种精神气质之中,即公有主义、普遍主义、无偏私性、原创性和怀疑主义。正是通过原创性科研成果,人类知识才得以不断增长。从科学家转型为科学社会学家的齐曼提出,所谓原创性,就是给人类知识库“添新砖”“加新瓦”。比如,提出新科学问题,探索新研究方法,获得新数据,提出新理论、新解释,或者是以上的组合。可以说,原创性是科学的精气神。

英国针对大学的“卓越科研评价框架”(以下简称REF),对科研成果的原创性提出相对可操作的定义,即原创性,指的是某个科研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对某个科研领域的理解和知识作出了创新和重要的贡献。具体来说,一个具有原创性的科研成果指的是,作出新的实证发现,或发现新材料,以及对这些新发现或新材料作出新解释;解决新问题或复杂难题;开发出创新性的研究方法、方法论和分析仪器设备;拓展出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研究视野;提出新论证或/和新表述、新解释或/和新洞见;获得或采集到新的数据;或/和对社会

政策和实践提出新理论、新分析或新表述。

英国对大学科研成果的评价,除了坚持原创性标准之外,还提出要兼顾对科研成果的“意义性”和“严谨性”进行评价。所谓“意义性”,指的是某项科研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对人类知识、学术思想或对社会政策和实践产生影响,或者对它们具有多大的影响潜力。也就是说,要全面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

所谓“严谨性”,指的是某项科研成果是否充分体现学术严谨性、体现学术诚信科研伦理,使用的概念、分析方案、数据资料、理论和方法论是否确凿可信。比如,NgAgo基因编辑技术、人类胚胎的编辑技术等所谓科研成果,违背了科研诚信和伦理,因而不符合“严谨性”评价标准。

英国REF对科研成果采取“专家同行评议”和“分类评价”。REF将科研成果划分为四大类学科进行评价。第一类:物质科学、工程和数学;第二类:医学、健康和生命科学;第三类:社会科学;第四类:人文与艺术。REF把科研成果的原创性(以及科研成果的意义性、严谨性),划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四星、三星、二星、一星。

以物质科学、工程和数学大类为例,对科研成果原创性(含科研成果的意义性、严谨性)层次的评价标准为:如果某项科研成果具有或潜在具有下列某些特征,可评定为四星:开辟新科研议程,导致其

他科学家跟随、跟踪或跟风;引领世界科研,走在国际前沿;对提出新思维、新技术、新结果具有很强的新颖性;对科研主题和议程具有重大影响;提出新范式或崭新的概念;对社会政策或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对生产过程、工艺流程和管理产生重大影响;对用户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某项科研成果具有或潜在具有下列某些特征,可评定为三星:在国际层面,对某科研领域作出重要贡献;对某领域的知识、思想和方法作出重要贡献,并将产生持续的影响;对社会政策和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对生产过程、工艺流程和管理产生重大影响;对用户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某项科研成果具有或潜在具有下列某些特征,可评定为二星级:产生有用的知识,对某领域有一定影响;作出渐进性贡献,比如为已有理论和范式“添砖加瓦”;对社会政策或实践产生一定影响;对生产过程、工艺流程和管理产生一定影响;对用户产生一定影响。

如果某个科研成果质量等,远远低于上述标准,则列入“忽略不计”行列。

个人认为,科研成果的原创性,大体可以划分为,顶级层次:在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国际一流

层次:在国际上顶天立地;国际二流层次:国际认可;国际一流层次:国内认可。还有很多科研成果缺乏原创性,可“忽略不计”。

REF规定,对大学科研成果评价,不得看影响因子,只看被引用数。REF在新的大学评估指南中说:“任何评估组(即四大类学科主评估组以及下属34个小学科评估小组),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不得考虑发表该成果的期刊影响因子,不得考虑期刊档次和级别。”若干小学科评估小组明确表示:科研成果评价中,彻底不看引用数,比如“工程”评估小组;社会科学类中,除“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评估小组之外的所有其他小组。“艺术与人文”大类,一律不看引用数。对那些看被引用数的评估小组,REF提示说:“被引用数仅仅是辅助参考指标,必须以专家同行评议作为主要评估方式。”

在新时代,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在评职称、建立“准聘—长聘”制度、授予各种“帽子”以及科研评奖时,应逐步转换评估标准和评价思维,淡化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将科研成果的原创性作为最高评价准则。另外,科研评价必须高度重视“首发权”(priority)。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正如默顿指出:“如何让原创性成果得到社会承认,让原创性成果的优先权实至名归,是一个重大问题。”我国科学家应充分利用国内中英文期刊获取科研成果的“首发权”。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学术速递

栏目主持:韩天琪

### 赵大海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公众信任对医疗卫生系统运行的意义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发达国家在该领域已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而我国尚未有公众对医疗卫生系统信任的研究。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大样本调查,对我国公众对医疗卫生系统信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公众对医疗卫生系统信任的比例为25.2%,远低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和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是影响其对医疗卫生系统信任的最主要因素。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拥有较高的公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水平和最低的医疗服务满意度水平。如果没有较高水平的公众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我国公众对医疗卫生系统的信任状况将更加不容乐观。提高医疗服务满意度,是提升我国公众对医疗卫生系统信任最为可行的政策措施。

——《中国公众对医疗卫生系统的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01期

### 李维武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发生在100年前的五四运动,使“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人新的价值观念与理想追求。中国思想世界的这一新变化和新发展,其间经历了许多的思想争论,这些争论主要围绕三个相关联的问题展开:中国要不要选择社会主义?中国要选择何种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及其争论,构成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世界得以确立的主要思想环节。这种社会主义新价值观,不仅具有五四运动的“救亡”性质,而且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不能被曲解为“救亡压倒启蒙”来加以贬抑或否定。

——《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确立》,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2期

### 彭春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斯宾塞著述跨语境的翻译、传播、意义歧变与交叉影响,是工业革命后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思想史事件。1898年,《昌言报》连载了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文集》。其中,《论进境之理》所对应的原作《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一文刊于1857年,浓缩呈现了斯氏进步哲学的整体设想。它区分了“可知”与“不可知”,将科学与宗教的共生作为理解进步问题的前提。译作整体上淡化了原作“不可知”范畴所指向的宗教视域,相对放大了原作基于“可知”领域的科学所建构的物质宇宙图景。斯宾塞站在宇宙自然演进的立场上,强调只有祛除以人为中心的目的论视域,才能体察进步的本土性;译作相关段落违反原义,充分肯定人的意志和能力乃进步的中心。而反复对《论进步》首段的

不同翻译,提示出中国另一条接受斯宾塞进步哲学的线索。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美关于斯宾塞的新知传入日本,又在日本被重新诠释。1902年旅日后,章太炎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积极转变。通过东学的新知识渠道及“滤镜”功能,他对斯宾塞的认知有偏狭地维持在其重科学、漠然宗教的维度上。英、日、中数种文字的斯宾塞文本及其评价的曲折译传,产生了负负相加的跨文化误读,反映了早期全球化过程中知识生产的某种悖状。

——《何为进步:章太炎译介斯宾塞的主旨聚焦及其投影》,载《近代史研究》,2019年01期

### 田宏杰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教授

研究性教学已成为我国当下高校教学改革的风向标,大有取代传统教学之势。然而,目前所谓的研究性教学依旧是对知识中心主义教学理念的固守,难以摆脱对传统教学范式的路径依赖。要实现“为创造而教”的理想和“为创新而学”的目标,就要超越知识中心主义的局限及其带来的教学标准化、凝固化、知识时代的学教共识,构建多元化、开放、动态的学教共同体,推动研究性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

——《超越知识中心主义:研究性教学的反思》,载《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02期